

有闲阶级论

[美] 凡勃伦 著

蔡受百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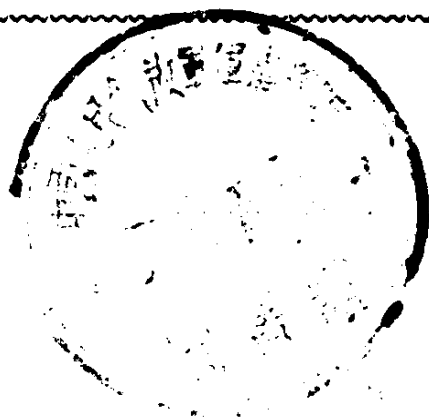
有 閑 阶 級 論

—关于制度的經濟研究

[美] 凡 勃 伦 著

蔡 受 百 譯

~~~~~  
本书是供內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4 年 · 北京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內 部 讀 物

有 關 階 級 論
——关于制度的經濟研究
〔美〕凡勃倫著 蔡受百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7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4017·96

1964年8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216千字
印張 9 ^{9/16}	印數 1—5,000册
定價(9) 1.3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評凡勃伦的經濟學說

托斯丹·本德·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制度學派的創始人。

凡勃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挪威移民的家庭里,在青年时代,他入卡尔登学院讀書,受业于美国边际效用学派首領約翰·貝茲·克拉克。大学毕业之后,凡勃伦又入耶魯大学研究院。后来凡勃伦曾在康奈尔、芝加哥和斯丹福等大学教書。凡勃伦在耶魯大学时就写过一篇《論 1837 年恐慌》的經濟論文。他的成名是在 1899 年发表《有閑階級論》這本書之后。在二十世紀初,凡勃伦繼續发表了《企业論》(1904 年)、《現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1919 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 年)、《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1923 年)等著作。

凡勃伦的經濟學說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曾經引起热烈的爭論。这个別树一帜的庸俗学派在本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达到它的发展高峰。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成为凡勃伦學說的信徒。在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期,制度学派的一些成員还参与了“新政”的筹划。

制度学派的产生和它的一度兴盛,同美国社会經濟和階級斗争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我們知道,美国原是資本主义发展比較晚的一个国家。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 1894 年,美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已超过其他資本主义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二十世紀初,美国已經变成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也成为資本主义矛盾最深刻的国家,階級斗

爭十分尖銳。在十九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美國工人就大規模地展開了反對壟斷資本的罷工、示威和飢餓進軍等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運動有了更加廣泛的發展。在1905至1912年之間，美國工人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罷工，發動了各種反對壟斷資本剝削的英勇鬥爭。

在社會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情況下，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深感到傳統的辯護理論已經陳腐，不能適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和反對無產階級鬥爭的需要，因此在二十世紀初，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積極尋找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凡勃倫的經濟學說就是在此種情況下產生的。

(一)

凡勃倫是以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評家”的面目出現的。按照他的說法，到十九世紀中葉為止，一切經濟學說都是建立在享樂主義的心理學和“確信世事變遷的過程中，有漸入佳境的趨勢”(《近代文明中科學的地位》)這兩個原則的基礎上。凡勃倫認為，享樂主義的心理學把人看作是“快樂和痛苦的計算者，俯仰浮沉於刺激力推動之下，好像一團性質相等的快樂欲望的血球”，這種見解把人看作是被動的，其行動主要受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的衝動支配，這是同新心理學不符的。至於世事“有漸入佳境的趨勢”，按照凡勃倫的說法，這是形而上學的，以這種淵源於神學的观点為前提的關於自然規律的理論、關於自發調節的理論以及其他理論，也都與事實不符。在凡勃倫看來，以往經濟學說的前提既然與事實不符，它們的理論體系也就不可能正確。

顯然，凡勃倫的“批評”並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以往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他的“批評”不過是出於這個事實，即，在壟斷組織

占統治地位、經濟危机日趨嚴重、勞動群眾的貧困日益加深和階級鬥爭不斷尖銳的情況下，舊的庸俗經濟學所宣揚的自由競爭可以自發地和諧地調節社會經濟，促進財富的生產，充分滿足人們的欲望，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等等謬論已經同客觀事實格格不入。為了便於另創一種新的“學說”，更好地為資產階級效勞，他才對過去的庸俗經濟理論作出這樣的“批評”。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凡勃倫以十九世紀末在美國產生的新心理學為基礎，創立了所謂“制度”經濟學說。他認為，經濟學說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人類經濟生活借以實現的各種制度。在他看來，制度是由思想和習慣形成的，而思想和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所以制度歸根結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認為，本能樹立了人類行為的最終目的，推動了人類為達到這種目的而作的努力，理智則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個人和社會的行動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導的。這些行動逐漸形成思想和習慣，進而形成制度。制度產生之後，就對人類的活動發生約束力，本能所產生的目的就在已經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實現。凡勃倫認為，對社會經濟生活和制度起決定作用的本能分為三類：（一）父母的天性；（二）工作的本能；（三）隨便的好奇心。因而，他把對制度的分析，最終都歸結為對心理的分析。在分析心理現象變化的時候，凡勃倫又以人種學、文化史、生物學、自然歷史、宗教等為輔。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實際上是一個五花八門的大雜燴。

凡勃倫應用心理學來解釋制度的由來，又用庸俗進化論來說明制度的發展和演變。按照他的看法，制度既然是思想和習慣長期積累的產物，它就不可能進行根本的改變。凡勃倫認為，生物界的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敗的規律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也就是人類的思想和習慣的自然淘汰過程，或人類應付外界

环境的心理的变化过程。他在研究制度的发展过程时又把两类制度作为研究的中心，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前者出自人类的虚荣本能，后者出自人类的工作本能，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他对近代经济生活的分析中贯穿着对这两类制度的分析。从庸俗进化论出发，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一、野蛮时代；二、未开化时代；三、手工业时代；四、机器方法时代。他详细论述了在这四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上述两类制度如何产生和变化。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就是根据上述思想写成的。为了了解他关于制度的基本思想，我们不妨从这本书引证几段话。在第八章中，凡勃伦写道：“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凡勃伦还写道：“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从这些话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凡勃伦对制度及其发展的庸俗见解。

从凡勃伦的上述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脱出旧的庸

俗經濟学的窠臼。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經濟制度，即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中曾經科学地說明社会經濟制度的性質以及它同人們的思想意識的关系。他写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① 凡勃伦根本反对馬克思的这个观点，他一如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各个庸俗学派，宣揚社会經濟发展取决于主观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原因，把制度归結为在人們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并用这种受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的制度来代替社会經濟制度。从这种庸俗見解出发，凡勃伦完全歪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把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說成是由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可以随思想和习惯的轉变而改变的。

在制度进化問題上，凡勃伦把庸俗进化論搬到經濟科学中来，把社会发展規律和生物进化規律等同起来，其目的完全在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馬克思根据客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深刻地闡明：社会的物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

^① 《政治經濟学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地发生变革。馬克思还分析了資本主义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凡勃伦宣揚庸俗进化論的形式和其他庸俗学派有所不同，然而它所要达到的反动目的与后者并无二致，它們都是为了反对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反对在二十世紀初正在欧美蓬勃发展的无产階級革命运动。

凡勃伦把自己的制度經濟学說看作是新的“理論”，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同德国的新历史学派作一个比較，便可看出两者的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不論新历史学派，还是凡勃伦，都从人們的心理或精神出发解释社会經濟現象；都強調經濟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制度的历史进化过程；都致力于描述社会經濟生活发展的表面現象；都抛弃对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而热中于寻找一套能克服資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所以，凡勃伦的学說实际上乃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

(二)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凡勃伦如何应用他上述的思想来解释資本主义制度。他認為，从生产技术方面來說，現代經濟发展是处于“机器方法”的时代。在現代工业社会中，“除非依靠已被接受的机械装备和机械操作的帮助，否則就不能进行”。机器工业已在工业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其余部分都以机器工业为轉移。机器方法使工业变成高度复杂的完整的有机体，物質生产是由各种連續操作的結合形成的，“由于各項操作之間的这种連結关系，現代工业体系中含有一种广泛的、平衡的机械操作性質。”（《企业論》）同时，各种操作要求标准化和高度精确。就人类的物質福利來說，这种工业制度能够无限制地进行物品的生产。就財產所有权來說，它在現代經濟中表現为資本的所有权。工业技术的运用完全以企业家

的意旨为主。而“企业的动机是金錢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實質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結果是財富的积累。誰要是目的并不在于增加財產，他就不会参加企业，更不会在独立的基础上經營企业。”（同上書）因而，“整个工业系統所由构成的各种操作如能順利、无間断地相互配合，是最有利于社会的經濟福利的；但事情的处理掌握在企业家中，而工业平衡无阻的維持，并不一定最有利于企业家。”（同上書）工业和企业之間的矛盾就是凡勃伦整个經濟理論分析的主題。在他看来，資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就是根源于工业和企业之間的对立。

依据工业和企业的划分，凡勃伦进而把資產階級社会分为两大階級：一是物質生产者，如工程师、技术員、科学家和工人；一是老板、經理和商业推銷員等，他們依靠所有权而控制工业，其目的在于获取优厚的利潤。他認為，在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应用的初期，財產所有者通常亲自監督工厂的生产，兼做工业生产的技术专家和商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由技术人員专管，商人則完全注意財務問題。

凡勃伦說，企业是依靠运用价格制度来获得优厚利潤的。为了在买卖中得到最大的利潤，企业界广泛地流行着欺詐行为，工业中普遍确立最大的独占。按照凡勃伦的說法，在机器应用的初期，貨物价格低廉，引起了市場的扩大，这时曾經产生剧烈的自由竞争。現在由于技术急速进步，产品大量增加，市場不能随之扩大，因而价格竞争逐漸消失。在十九世紀末，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市場相对縮小，商人企图以限制产額来保全利潤，因而引起了企业的集中和合并，出現了托拉斯等垄断組織。

在凡勃伦看来，現代經濟生活中的这两种对立形态——工业和商业，完全是起因于生活习惯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按照他的

解释,工业中的生产者受到机器生产的訓練,养成了从因果关系来观察物質和解释事实的习惯,他們都具有一种怀疑的、惟事实是問的、不講道德、不講爱国心的性質。因此他們逐漸摆脱了过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影响。而商人則同利害相联系,因此他們所关心的是金錢利益、权力、財產的多少,金錢思想支配一切,而他們的許多思想习惯都是由过去的习俗蜕变而来的。在《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商业企业》一書中,他又認為現代的主要工业已联合起来,为銀行所操縱。他表面上譴責这些“不在所有者”控制了一切权利,阻碍了工业生产,但又吹嘘垄断組織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所起的稳定作用。

根据所謂工业和企业对立的謬論,凡勃伦在《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他主张經濟控制权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員組織起来的“技术人員委员会”掌握,以代替企业經營的統治。他虽然提出了这个改革方案,但是他始終沒有提出現代社会應該按照这个方案实行改革,因为在他看来,人們的思想习惯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改革。

凡勃伦在論述工业和企业的矛盾时,虽然不得不承認資产階級社会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生产只服从于資本家的利欲,而不是为了滿足人們的消費,資本主义市場日益縮小,企业长期开工不足等。然而他不仅避而不談产生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极力歪曲这种矛盾,把它說成是工业和企业經營之間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被归因于思想习惯的不同。

凡勃伦极力歪曲資本主义社会中的階級关系还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力图抹杀資产階級和工人之間的对抗关系,把两者統統看成“既得利益者”,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斗争說成是商业性質的競争,同时荒謬地把科学技术人員說成是一个独立的階級,

宣揚他們是社會物質福利的真正保衛者。他用由科學技術人員構成的所謂工業家同商人的對立，來偷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事實上，科學技術人員並不是什麼獨立的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他們一般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決不可能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中起領導作用。

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生產和交換總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在生产領域中剝削的剩餘價值，是要通過流通領域即商業來實現的。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決定了流通的資本主義性質，所以它們之間並不存在什麼本質上的矛盾。的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和流通之間也會出現某些矛盾，例如工業家和商人在剩餘價值的分配方面發生的矛盾，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矛盾是“兄弟鬩牆之爭”，而不是產生失業、開工不足和經濟危機的原因。

(三)

前面說過，凡勃倫認為，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兩種制度，一種是財產所有權或金錢關係的制度；一種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技術或物質生活的工具供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兩種制度的具體形式是企業經營和機器方法。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這本書就是研究在財產所有權或金錢關係的基礎上怎樣形成了所謂“有閑階級”和這個階級的地位與作用。他對“有閑階級”的分析是完全立足在他對制度及其發展的理論的基礎上的。首先，凡勃倫應用“歷史起源法”來說明“有閑階級”怎樣從遠古時代的歷史胚胎中產生出來，又怎樣經歷了不同的形態變化；其次，他又從人的本能、思想、習慣出發來說明有閑階級的形成以及它的“地位和价值”。

他写道：“本書的主旨在于討論作为現代生活中一个經濟因素的有閑階級的地位和价值，但是感覺到要把討論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內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經濟学范围以內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給予相当的注意。”

在第一章《緒言》中，凡勃伦認為，在野蛮时代，不存在經濟特权和业务分化，因而还不存在“有閑階級”；但是从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那些部落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可以看出“有閑階級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部落发展到未开化的阶段这一轉变中逐漸涌現的。按照他的意見，有閑階級的产生最初表現在业务分化上，在生活习惯上，男女担任着不同的工作，生产业务和非生产业务之間有了区别，出現了身份的差别。在未开化的較高阶段，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这些非生产性业务归上层階級掌握。生产性业务則由下层階級担任。这种业务的差别是具有歧視性的，非生产性业务在习惯上被認為是光荣的、值得尊敬的。在現代社会，这种区别仍然变相存在。总之，凡勃伦把階級的产生說成是人們的生活习惯轉变的結果。他認為，在原始的野蛮时代的和平生活习惯轉变为坚决好战的生活习惯以后，侵占就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比較重要的因素，因而产生了侵占和劳役之間的职能分化和业务的区别，階級区别也就产生和形成了。

在第二章《金錢的竞赛》中，凡勃伦認為，“有閑階級”是和財產所有权同时出現的。財產私有制出現以后，人与人之間就发生了占有商品的竞赛。而人們之所以占有財產，財產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財產可以証明財產所有人比社会中其他的人占有优势地位，它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习惯的基础，是滿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說，在凡勃伦看来，占有財產并不是为了剝削別人，而

仅仅是为了滿足虛榮心和自尊心。实际上，凡勃伦在这里是把虛榮心和自尊心說成是产生階級的一个原因。

在第三章《明显有閑》中，凡勃伦描繪了在金錢竞赛中金錢(財產)占优势的階級如何力图过有閑的生活。他認為，他們所以不願参加劳动，是由于他們的心理和劳动階級的不同。在习惯的道德标准的支配下，他們把参加劳动看作是有損体面的事情。在他們看来，只有过有閑生活才能保持自鳴得意的心情，才能显示自己比別人优越。他們日常只是从事一些沒有实际作用的腦力劳动，如学习礼仪，講求修养等等。在第四章《明显消費》中，凡勃伦說明在金錢上占优势的階級如何从显示自己的优越和榮譽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財產的浪費性消費；并說明有閑階級的存在如何产生了不事劳动的主妇和一批仆从、門客等的“代理有閑”和“代理消費”。在第五章《金錢的生活水准》中，凡勃伦認為，为了在消費的財物的数量和等級上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有閑階級”总是爭取提高消費水准，它在消費上超过物質生活所必需的程度。根据凡勃伦的解释，人們爭取提高消費水准的动机是在于滿足竞赛心理和“歧視性对比”的要求，其目的不过是要在榮譽方面符合高一等人的生活习惯。在第六章《金錢的爱好准则》中，凡勃伦說明，在財產私有制度下，由于金錢財富成为取得榮譽和博得尊敬的基础，它也就成为評价一切事物的标准，無論是宗教、美感、实用性还是对美物的占有，都是以显示金錢为目的。第七章《服装是金錢文化的一种表現》，則描述了有閑階級在服装上的好奇斗胜和极力奢侈，說明他們如何借此夸耀自己的財富，表現自己的有閑和浪費性的消費。

在第八章《工业的脫离与保守主义》和第九章《古代遺风的保持》两章中，凡勃伦对制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說当前的制度同工业的发展已不相适应，但人們总想保留原有的思想和习惯，因

而制度改革引起了有閑階級和貧困階級的“保守主义的阻撓”。他还从遗传和自然淘汰等方面解释现代社会中有閑階級的性格是怎样从远古残存下来和留传下来的。他还分析了金錢制度所形成的有閑階級的性格怎样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在后几章中，凡勃伦进一步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职务、好斗的气質、体育竞赛、爱好賭博的心理、信仰命运、宗教迷信以及对高級学識的研究等等，認為它們都是同金錢制度相联系而由远古遗传下来的有閑階級的“素質”和特性，它們都不符合工业发展的要求，是工业階級所沒有的。

尽管凡勃伦在这本书中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某些現象作了片断的表面的描繪，然而从我們对该書各章的部分內容的簡單介紹中，不难看出，他不但沒有对这些現象作出任何正确的解释，而且对产生这些現象的原因作了各种歪曲的解释。同时，他避而不談資產階級社会的真实的階級关系，极力掩盖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的剝削。我們知道，“所謂階級，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資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們在一定社会經濟結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凡勃伦捏造了所謂有閑階級，又把這個階級說成是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习惯等的差异所产生的。这样，他一方面用所謂有閑階級同工业階級的差异偷換資產階級同无產階級的对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对立的形成归之于心理原因。凡勃伦的观

^① 《伟大的創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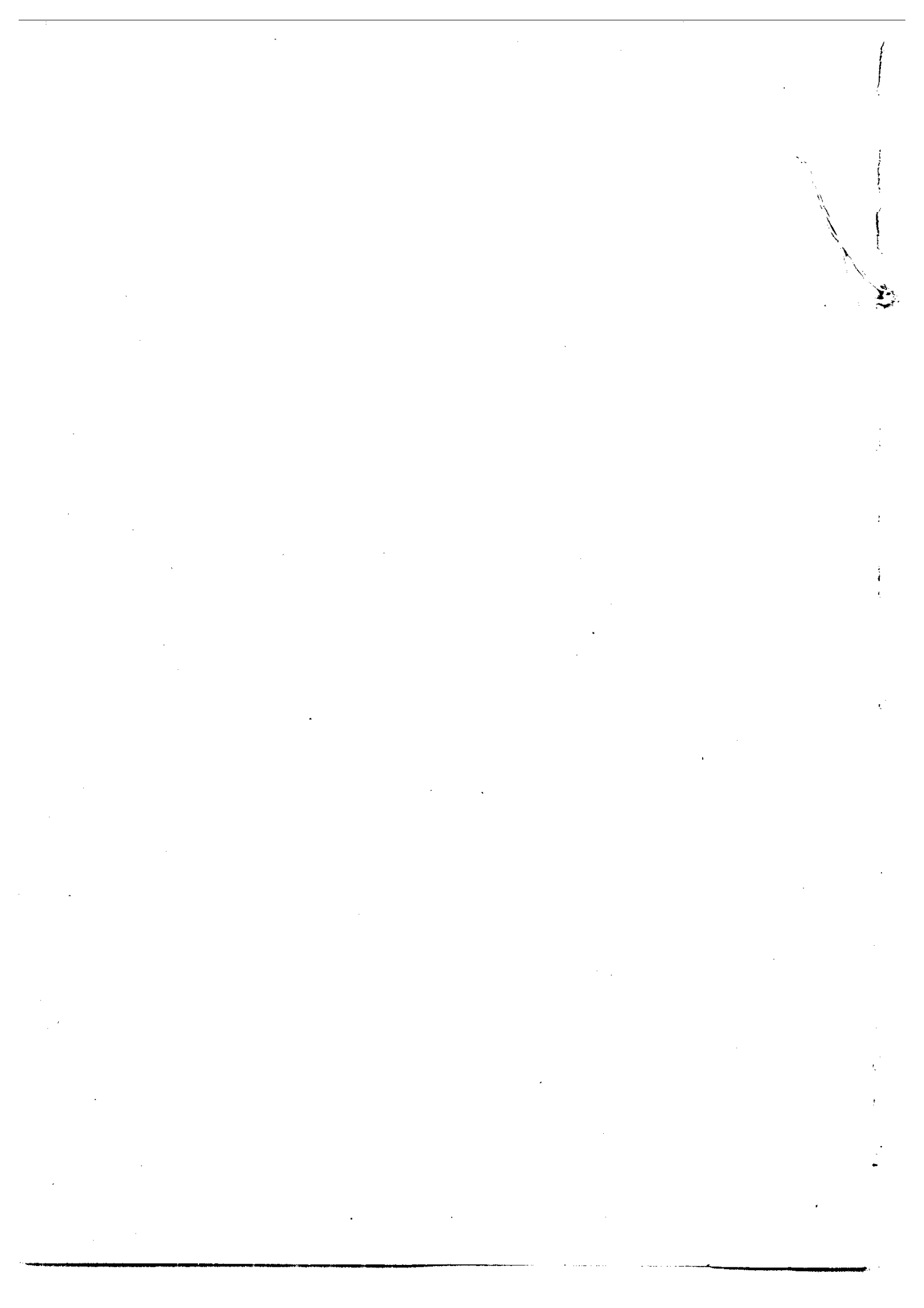
点所能导致的結論只能是：要消灭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等待人們的思想、习惯和心理逐漸改变，什么階級斗争、无产階級革命，都无济于事。由此可以看出，凡勃伦以資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家”的姿态出現，实际上却是資產階級的忠实辯護士。

鍾 政

1964年6月

目 录

原序	3
第一章 緒言	5
第二章 金錢的競賽	20
第三章 明显有閑	30
第四章 明显消費	53
第五章 金錢的生活水准	76
第六章 金錢的爱好准則	85
第七章 服装是金錢文化的一种表現	122
第八章 工业的脫离与保守主义	138
第九章 古代遺风的保持	154
第十章 遺留到現代的尚武精神	177
第十一章 信賴命运	199
第十二章 宗教信仰	212
第十三章 非歧視性利益的殘存	240
第十四章 高級学識是金錢文化的一种表現	261



原 序

本書的主旨在于討論作为現代生活中一个經濟因素的有閑階級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要把討論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內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經濟学范围以內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給以相当的注意。

有些場合，討論的进行是以經濟学理論或人种学通則为依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許会使讀者感到陌生。在緒言那一章里充分說明了这类理論前提的性質，希望由此可以避免在理解上的扞格。有关的理論观点，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卷发表的《作业本能与劳动厌恶》、《所有权的起源》与《妇女的未开化身份》一系列論文里，作了比較詳切的叙述。但这类推論的一部分是創見的，假使在讀者看来，由于它缺乏根据或缺乏作为根据的事实而覺得不合，那末要曉得，本書的論点以这类部分創見的推論为依据时，并不是完全不顧到它作为經濟理論中的一个細目的可能有的价值。

为了說明或加强論証而采用的一些資料，部分为了方便，部分也为了大家对于所熟悉的現象的意义发生誤解的可能性比較少的緣故，所以总是尽量凭直接观察或通过尽人皆知的事物从日常生活中汲取，而不求之于更深一层的比較奧妙的来源。这里所引証的大都是些平淡无奇、家喻戶曉的事例，对于一些世俗現象，或在日常生活中已司空見慣因而往往不再作为經濟研究对象的一些現象，有时候也似乎有些漫无抉擇地拿来討論，希望这种作法不致触犯任何讀者的喜爱文艺或科学性的感情。

有些理論前提或确凿例証是取自較远一层的来源的，有些学理或推断是从人种学引来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尽可能取其比較熟悉、比較容易查考的一类，这在相当博学的人們是不难寻根究柢的，因此沒有依照慣例列举所引証的出处。同样，这里所偶尔采用的一些引文，主要是为了举例說明，也无須加注，大都是一見即可了然的。

第一章 緒言

有閑階級制度在未開化文化下的較高階段獲得了最充分發展；封建時代的歐洲或日本就是例子。在這樣的社會里，階級的劃分非常嚴格；在階級差別中具有最突出的經濟意義的一個特點是，各階級的正式業務彼此之間截然不同。上層階級按照習慣是可以脫離生產工作的，或者是被擱于生產工作之外的，是注定要從事于某些帶幾分榮譽性的業務的。在任何封建社會，最主要的光榮業務是戰爭；教士職務在光榮程度上一般認為是次于戰爭的。如果某一未開化社會並不怎樣特殊地好戰，那么在光榮程度上教士職務也許會躍居首位，而軍人次之。但不管是軍人也好，教士也好，上層階級對生產工作總是置身事外的，這是他們的優勢地位的經濟表現——這個原則總是不變的，是很少例外的。關於這兩個階級的脫離生產工作，印度的婆羅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些處於未開化文化較高階段的社會里，可以籠統地稱作有閑階級的那個範圍內，包含着許多不同的分支階級；隨着分支階級的不同，擔任的業務也有很大差別。整個有閑階級包含貴族階級和教士階級，還有兩者的許多隸屬分子。各階級的業務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經濟特點，那就是在性質上總是屬於非生產的。這類非生產性的上層階級業務，大致歸納起來是以下幾項——政治、戰爭、宗教信仰和運動比賽。

在較早但不是最早的未開化階段，有閑階級在形式上沒有這樣多種多樣；不論是階級的區別或有閑階級各種業務之間的區別，都不是那麼精細和複雜的。波利尼西亞(Polynesia)島民的生活，

就很能体现这一发展阶段；只有一点是例外，由于那里缺乏凶禽猛兽，狩猎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没有能占到它通常所占有的光荣地位。又如中世纪时的冰岛部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个部落里，各阶级之间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业务之间，都有严格区别。凡是体力劳动、生产工作或是同谋生直接有关的任何日常工作，都是下层阶级的专有业务。这一下层阶级包括奴隶和其他从属者，通常还包括一切妇女。如果贵族中含有若干高低不同的等级，则属于较高级的贵族妇女一般是不参加生产工作的，或者至少是不参加比较粗笨的体力劳动的。至于上层阶级的男性对一切生产工作不但不参加，而且按照传统习惯是不容许参加的。他们的业务范围有严格规定。这类业务上面已经提到，不外是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这四个方面的活动支配着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至于就这个阶级中的最高级——国王或酋长——来说，这数者乃是社会的习惯和常识所允许的仅有的活动。实际上在充分发展的生活方式下，在那些社会里，对属于最高级的成员来说，即使是运动比赛，是否算作适当活动也还是有些疑问的。就有闲阶级中较低的几个等级来说，某些别的业务是开放的，但这些只是附属于上述这一或那一典型的有闲阶级业务的；例如武器与其他军用装备以及战船的制造和管理，如鹰、犬、马的调理和驯养，如祭祀用品的备办等等。下层阶级对于这类次一等的的光荣业务，除非显然是属于生产性，除非跟典型的有闲阶级业务只有一些疏远的关系，否则是不能染指的。

如果从这种典型的未开化文化阶段倒退一步，追溯到未开化文化的较低阶段，那就不再能看到在充分发展形态下的有闲阶级。但有闲阶级制度，就是从这种未开化时代的较低阶段下的风俗、习惯、动机和环境而来的，这个时代显示了有闲阶级早期成长的迹

象。現在处于世界各地的游牧狩猎部落，可以說明这种分化的比較原始的形态。北美洲的任何一个狩猎部落，都可以拿来作为說明的例子。很难說在这类部落中是存在着一个明确的有闲階級的。这里存在着职能上的分化，在这个职能分化的基础上也存在着階級的区别；但是就上层階級脱离生产工作这一点來說，却没有发展到这样地步，使“有闲階級”这个詞得以明确成立。处于这一經濟水平的部落，其經濟上的分化已經达到这样程度，使男女之間的业务有了显著区别，但这种区别是带有歧視性的。几乎在所有这些部落中，根据传统习惯，妇女所担任的业务，就是在下一发展阶段中形成的純生产工作的根源。男子是不参加这类粗鄙业务的，他們生来是要从事于打仗、打猎、运动比賽和宗教崇奉的。在这个方面，通常存在着极其严格的区别。

在未开化时代的較高阶段，劳动階級与有闲階級有明确区别，而上述业务上的划分正与这一区别相一致。后来在业务上日益多样化和专门化，由此形成的分界綫就逐渐把生产业务与非生产业务分了开来。在未开化时代初期的男子业务，并不是后期的生产工作的任何主要部分所由形成的根源。初期的男子业务残存在后期发展中的，只是些不能列入生产項下的业务——战争、政治活动、运动比賽、学术研究和宗教崇奉。其間仅有的显著例外是漁业的一部分和不能肯定列入生产工作的某些細巧业务，如武器、玩具和运动用品的制造。事实上整个生产业务是从原始未开化社会由妇女担任的那类业务蜕化而来的。

在未开化时代的較低阶段，男子的工作对团体生活的維持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女子所担任的工作。甚至对团体中食料以及其他必要消費品的供应，男子在工作上的贡献，可以說也具有同样的重要程度。男子工作的这种“生

产”性，实际上竟是那样地显著，所以在一般经济著作中，往往把猎人的工作看成是原始生产工作的典型。但在未开化民族自己看来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猎人，在他自己看来却不是劳动者，在这一点上他不容许把他与妇女等量齐观；他的劳动也不同于妇女们的苦工贱役，是不能作为一种生产工作，跟妇女们的工作混淆在一起的。在一切未开化社会中，男子工作与女子工作泾渭分明，这一点自有它的深远微妙的意义。男子的工作也许有助于团体生活的维持，但他感到这只是由于他的才智优越，成就卓著，假使把他的工作同妇女们的平凡的辛勤劳动相提并论，那就不免要贬低他的身价了。

如果在文化标准上再退后一步，让我们看一看野蛮部落中的情况，那就可以看到，在业务上的分化更加含糊，各阶级以及各种业务之间的歧视性区别，也更加缺少一贯性和严格性。关于这方面，要在原始的野蛮文化中找到明确的例子很不容易。那些被列为“野蛮人”的部族或团体，很少是不带有从较进步文化阶段退化而来的迹象的。但有些部落——其中有一部分显然不是由于退化的结果——却相当忠实地显示出原始野蛮时代的特征。它们的文化与未开化社会的有所不同，其特点在于不存在有闲阶级，在于大都不存在有闲阶级制度所依存的那类意志或精神状态。这种不存在经济特权阶级的原始野蛮部落，在整个人类中只占着一个极其细小的、不显眼的部分。就这一文化状态而言，这里可以举出的尽可能适当的例子是安达曼 (Andaman) 群岛诸部族或尼尔基里 (Nilgiri) 山脉的托达斯 (Todas) 部族。当它们最初与欧洲人接触时，就不存在有闲阶级这一点说来，它们的生活方式几乎可以说是独具一格的。或者还可以举虾夷岛的虾夷族作为一个例证；此外还可以列举布西曼 (Bushman) 和爱斯基摩某些部族，但以此作为

例証是否恰当，比較地有疑問。至于某些拍布羅(Pueblo)部族，是否可以列入這一類的例子，則更加難以確定。這裡所列举的一些部族，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可能是從較高文化階段退化而來的，它們的現有文化水平也許並不是它們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若果是這樣的話，在這裡使用這些例証有些勉強；但儘管如此，把它們看作好像是真正的“原始”民族，作為例証說明時的效果還是一樣的。

這些不存在明確的有閑階級的部落，在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某些別的特征方面，彼此也有相類之處。它們都是些小型團體，它們的結構都是簡單的，古老的；它們大都是和平的，定居的；它們都很窮；個人所有權在它們並不是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但這並不是說它們就是現存各部落中的最小型的，也不是說在社會結構的一切方面的分化程度上是最低的；它們也並不一定代表着沒有明確的個人所有制的一切原始社會。不過應當注意到一點，這類部落似乎是人類原始部落中的最和平的，也許是特殊地偏向於和平的。情形確是這樣，當碰到暴力或受到凌辱時，那種溫厚而荏弱無能的表現，是這類部落的成員所共有的一个最顯著特征。

從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那些部落的一些風俗習慣和文化特征可以看出，有閑階級制度是從原始的野蠻階段到未開化階段的轉變中逐漸涌現的；或者說得再恰當些，是從和平的生活習慣到堅決好戰的生活習慣的轉變中逐漸成長起來的。要使這個制度能以明確的形態出現，顯然必須具備的條件是：（1）部落必須具有以掠奪為目的的生活習慣，必須有戰爭或大規模狩獵活動，或者是兩者俱備，這就是說，在這樣情況下構成初期有閑階級的男子們，必須習慣於用武力或策略來從事於傷害行為；（2）生活資料的獲得必須相當從容，從而有條件使部落成員中一個很大的部分可以脫離經

常的辛勤劳动。有闲阶级制度是各类业务在早期区别下的自然结果；根据这种区别，有些业务被认为是可尊敬的，有些业务则不然。在这种古老的区别下，凡是可尊敬的业务，可以归入属于侵占的那一类；不值得尊敬的业务，是那些必要的日常工作，在这类工作中，并不含有值得重视的侵占成分。

这种区别在现代工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重要意义，因此经济学者对这一点很少注意。按照现代常识，这种区别似乎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的，经济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对业务作出这样区别的这种观念，作为一种先入之见，实际上仍然是极其顽强地贯串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对仆役职务习惯地予以轻视，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个人性质的、在个人身份上分出尊卑的区别。在文化的较早阶段，在一切事势的形成过程中，人们认为个人力量具有比较直接、比较显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日常生活结构中，侵占要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分。利害关系在较大程度上集中在这一点。结果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作出的区别，在那个时代似乎比今天有着更大的必要性和明确性。因此作为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事实来看，这是一个实质上的区别，是具有确切不移和令人信服的根据的。

对于一些事态的习惯看法是由某些利害关系而来的，当利害关系有了变化时，对这些事态在习惯下形成的不同看法的依据，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当时的主要利害关系，对当前某些事态的说明能有所帮助，那么这些事态的特征就显得是鲜明而真实的。如果任何人对这类事态，是惯于用另一观点来理解，在另一目的下来评价的，他对于这类事态作出区别时的任何原有依据，看来就会觉得不真实。对活动的各种目的和方向加以区别，加以分类，这种习性哪里都始终不能避免；因为这是贯彻一种行动理论或实现一种

生活方式时所万不可少的。采取的究竟是哪一观点，或者对生活事态进行分类时，所选择的，所认为是明确的，究竟是哪一特征，决定于对事态作出区别时所追求的利害关系。因此，对事态作出区别时的依据以及对事态进行分类时的准则，是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渐变化的；对生活事态进行了解时的目的既已有了变化，观点也就跟着有了变化。由此可见，在某一文化阶段对某一类活动或对某一社会阶级公认为是显著的、明确的那些特征，在随后的任何文化阶段对事态进行分类时，不会再保有同样程度的重要意义。

但是各种标准和观点上的变化只是渐进的；某一观点一经接受，很少会突然消失或被全部推翻。生产业务与非生产业务之间的区别，现在习惯上依然存在；这一现代区别方式是未开化时代侵占与劳役的区别的变形。像这样一类活动，如战争、政治、宗教崇奉和公开欢乐，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同为了供应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而辛勤劳动，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今天在这方面的确切分界线，与早期未开化时代的当然有所不同，但就大体上的区别而言，早期的遗迹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灭。

今天所默认的、已经成为常识的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只有其最终目的在于利用“非人类的事物”的那类努力，应当算是生产性努力。人对人的强制利用，是不算作生产性活动的；但利用非人类的周围事物以提高人类生活的一切努力，都被认为是生产性活动。按照充分保持古典派传统的那些经济学者的看法，一般认为人类“征服自然”是工业生产力的特点。这种征服自然的生产力，一般认为应当包括人类征服兽类以及征服一切自然力的力量。这就在人类与下等动物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

但在别的时代，在抱有不同见解的人们看来，这条界线跟我们今天所划的并不完全相同。在野蛮的或未开化的人类生活方式

下，这条界綫是在不同場合、另一方式下划分的。处于未开化文化阶段的一切社会，对于两类广泛現象的对立，普遍存在着一种敏銳感觉，一类所包括的是未开化人类自己，还有一类是他們的食料。他們对于經濟現象与非經濟現象两者之間也存有对立感，但看法与現代方式不同，对立不存在于人类与下等动物之間，而存在于“有生气的”(animate)事物与“无生气的”(inert)事物之間。

我們宁可格外小心地解释一下，这里用“有生气的”这个詞所要表达的未开化人类观念，跟“有生命的”(living)这个詞的涵义有所不同。前者并不包括一切生物，却含有許多別的事物。像这样一些动人的自然現象，如风暴、疫厉、瀑布，都被看作是“有生气的”；而树上的果子，地上的青草，甚至一些不显眼的动物如鼠、羊、蝇、蛆之类，則除非作为集体来看，通常都不認為是“有生气的”。这里使用这个詞时，其間并不一定含有灵魂或精灵的存在的意义。野蛮或未开化人类是万物有灵論的信从者，他們对于有些事物，認為是具有一种实在的或假想的先发行动性的，因而中心畏惧；上述概念所包括的就是这类事物。这一范畴含义很广，它包含許多物体和自然現象。这样一种有生气者与无生气者之間的区别，直到今天，在一些不作深刻思考的人們的思想习惯中依然存在，对于有关人类生活与自然进程的通行理論，依然发生着深远影响；不过这一点在早期文化与早期信仰阶段的作用是极大的，是引起了深远的实际后果的，而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发生这样大的影响。

在未开化民族看来，对于无生气的、自然所提供的事物的加工和利用固然是一种活动，但这种活动，跟他們应付有生气的事物和力量的活动，絕對不是处于同一水准的。其間的分界綫也許有些含糊，有些变化不定，但大体說来，这种区别仍然充分切实有力，足

以影响到未开化者的生活方式。在未开化者的想像中，凡是列入有生气的那类事物，会在指向某种目的的情况下展开活动。正是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力的发挥，使得某些物体或现象“具有生气”。天真质朴的野蛮人或未开化者，当他们面对着一些非其意志所能控制的活动力时，就用他们唯一的、现有的说法来作解释，这种说法是从他们对自己动作的感知中直接产生的。因此，活动力与人类的活动同化了，活动的物体也在这个限度上与人类的主动力同化了。应付属于这类性质的种种现象时，尤其是应付一些其动作特别令人畏惧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时，就不能采取与应付无生气事物时同样的态度，就不能不在另一种精神下采取另一种态度。怎样才能顺利地应付这类现象，乃是一种侵占性而不是生产性的工作。这里着重的是勇武精神，而不是刻苦耐劳。

在这种把事物划分为有生气与无生气两种的天真看法的指导下，在原始社会中的活动就逐渐分化成两个类型，这在现代措辞下可以称之为侵占活动与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通过制作者施之于不作抵抗的（“死的”）素质的技巧、从事创造新事物、使之具有新用途的一种努力；而侵占活动，就其成果对活动者有效用这一点而言，是把原来由另一活动者导向另一目的的能力转变成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的努力。这里使用“死物”（brute matter）这个词时，仍然是从未开化者的观点设想的，是含有在他们的理解中的奥妙意味的。

所谓侵占与劳役之间的差别，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正相一致。两性之间不但在身材上、体力上不同，更加确定的恐怕还是在气质上有所不同；为什么很早就会形成相应的分工，其原因肯定就在这里。男性比较果敢、强壮、魁梧，应付突然的、剧烈的变故时比较能胜任，比较地长于自决、自主、争胜、进攻，因此关于侵占范围

內的一般活动总是属之于男性的。在原始社会的成員中，体格与生理上的特征以及氣質，两性之間的差別可能并不怎样显著；拿前已提到的一些古老的部族——如安达曼部族——来說，看来在这些方面的差別事实上是很細微的，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体格与意志上的差別出发向前演进，形成了业务上的分化时，原来在两性間的差別，其本身将趋于扩大。尤其是如果团体中成員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生物类型，使他們在刚毅、果敢这类品質上不得不經受認真的鍛炼时，一个針对着这种新的业务分配的累积性淘汰适应过程就从此开始。在团体生活中如果須經常从事于猎取凶猛的野物，关于坚定、敏捷、奋勇等偏于男性的品質就有較大需要，結果势必加速与扩大两性間的業務分化。一等到这一部落与别的部落发生了敌对性的接触，这种业务上的分歧将变本加厉，使侵占性工作与生产性工作达到进一步发展的形态。

在这样一个以掠夺为目的的狩猎者团体中，战争和打猎逐渐成为壮健男子的专职。妇女則从事于其他必要的工作，还有些不适宜于做上述的男子工作的别的成員，在这一意义上与妇女列入同类。但男子的行猎与作战，大体上属于同类性質。两者都是掠夺性的；作战者和行猎者同样是强占他者的所有，同样是不劳而获。他們凭着武力和机警从事于侵略活动，与妇女們辛勤而平淡无奇的操作，在性質上显然不同；前者不能算是生产劳动，实在是对物質的强力夺取。这就是未开化部族男子的工作，在其充分发展形态下，与女子的工作有极大的分歧，这个时候任何方式的努力，如果不涉及武力的使用，是不值得由男子去做的。这样的传统习惯逐渐获得巩固以后，就通过社会常識而成为行为的准则；結果是，在一文化阶段，任何业务，任何营求，除非是在勇武精神——暴力或狡詐——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則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子，就

在道义上不容許染指。这种掠夺的生活习惯，經過长期鍛炼在团体中根深蒂固以后，作为一个壮健男子在社会經濟中責无旁貸的任务就主要是厮杀，是消灭在生存竞争中在他面前企图抗拒或逃避的那些竞争者，是消灭那些頑强的敌人，把他們降为奴隶。許多狩猎部落对侵占与劳役这两者在理論上的区别，竟遵守得这样严格，这样認真，因此当男子获得了猎物以后，这些猎物必須讓他的妻子搬回家，他是不应该亲自动手做这件下賤工作的。

上面已經指出，侵占与劳役之間的区别，是业务上的一种歧视性区别。列入侵占一类的业务是可敬的，光荣的，高貴的；而其他不含有侵占成分的业务，尤其是含有奴性或屈服意味的那些业务，是不值得尊敬的，低賤的，不体面的。关于尊严、价值或荣誉这类概念，不論应用到个人或应用到行为，对阶级和阶级划分的发展，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此关于这类概念的起源和意义必須加以闡述。其心理上的依据可以大致說明如次。

出于淘汰的必然結果，男子是行为的主动者。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展开冲力活动——“目的論的”活动——的一个中心。由于他是一个行为的主动者，因此他在每一个动作中所寻求的，总是在于实现某种具体的、客观的、非个人性質的目的。他既然是这样一个行为的主动者，就有了一种爱好，他所好的是有效果的工作，所恶的是不切实际的努力。他所推重的是事物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鄙視的是不切实际、浪費和无能。我們可以把这种素性或习性叫作作业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一旦生活环境或生活传统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在效能上的对比，作业本能就会使这种对比成为个人之間的竞赛性或歧视性对比。对比的結果会发挥影响到什么程度，大部分須决定于民族的性格。在任何社会，如果是

慣于对个人作这样的歧視性对比的，則显然可見的成就将成为人們所寻求的目标，这个成就本身的效用，就是博得尊敬的依据。要博得尊敬，避免指摘，就得把个人的效能摆出来作証。結果通过作业本能所表現的是力量的竞相炫耀。

当处于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当团体还习于和平的、也許是定居的生活，还缺乏发达的个体所有制时，要显示个人的成就，主要的而且也許是最适合的方式是担任某种业务，这种业务是要能够有利于促进团体生活的。在这样一个团体的各成員之間，如果存在着經濟性竞赛的話，那末竞赛将主要是在于生产工作上的适用性。但这个时候竞赛的誘因还不强，竞赛的范围也不大。

当团体由和平的野蛮生活状态轉变到掠夺的生活状态时，竞赛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竞赛的机会和誘因，在范围方面，在迫切程度方面，就有了大大的扩充和提高。男子們的活动的“侵占”色彩越来越浓厚，而行猎者或作战者个人彼此之間的对比，則不断地变得越来越緩和，越来越习以为常。要表現勇武精神，最确切、具体的証物是战利品，这件东西在人們的思想习惯中漸漸占据了一个地位，漸漸成为生活点綴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特征。在戰場上和猎場上的追亡逐北中俘获累累，就会受到称許、贊叹，这是武功卓越的鉄証。侵略成为公認的行动方式；而战利品就是进攻胜利的事实証明。在这一文化阶段，公認為获得自决自主的最可敬的方式是战斗；而通过劫夺或强迫而获得的用品或劳务，正是战斗胜利的符合慣例的証据。用掠夺以外的方式取得任何事物，情形正相反，一个有身份的男子是不屑一顧的。基于同样理由，有关生产工作或个人服务方面的劳务，也受到了同样的憎嫌。于是一方是侵占或掠夺方式下的取得，另一方是生产工作，在这两者之間产生了歧視性区别。劳动是受到蔑視的，因此就有了惹人厌恶的性質。